

第一部

胜利者与失败者

抗日战争图书馆
www.krzzh.com

第一章 支离破碎的生活

1945年8月15日，正午前的一刻。此后发生的事情将永远不会被遗忘。 33

相原悠当时28岁，是静冈县郊区一个农民的妻子。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天的情景就像是一部老幻灯片，一部断断续续的黑白新闻纪录片，反反复复地在她的脑海中浮现。

她当时正在户外劳作，一个报信的人从村里飞奔而来。他呼喊着头皇将会在正午时进行“玉音放送”，就跑开了。

与这个消息相比，即使是敌国美利坚陆沉到海底的新闻，也不会更令人震惊了。天皇要讲话啦！自从继承天皇之位以来的二十年间，裕仁天皇从未直接向他所有的臣民们发过言。直到此刻为止，最高统治者的话，一直是通过“天皇诏谕”的形式传达下来的——或是印刷的诏书文本，或是由他人诚惶诚恐代读的敕谕。

半个世纪之后，相原仍然能够忆起每一个细节。她飞快地跑回村，不断地默念着《教育敕语》中的一句话，这是每个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每天背诵、牢记在心的。“一旦危机来临”，《敕语》上说，“你们就要义勇 34地为祖国献身”。她清楚国家的局势危在旦夕，只能想象着头皇将会激励每一个日本人，尽更大的努力来支持这场战争——实际上，也就是准备战斗到死。

村民们已经聚拢在地方上唯一的一台收音机前，这台收音机只能收听国家电台那个唯一的频道，接收质量很差。天皇的讲话被噼里啪啦的杂音包围着，讲话的内容也让人难以理解。天皇的声调很高，口气拘谨

而不自然。他没有用日常的口语，而是用一种非常正式的语言，时不时夹杂着典雅的古语。相原正在人群中跟其他人交换困惑的眼神的时候，她听到了一个新近因为东京轰炸才迁来此地的男人的自言自语。“这就是说，”那人喃喃道，“日本战败了。”

相原觉得所有的力气都从她的身体里流失了。当醒过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匍匐在地。在她身边受到打击的其他人，也都躺倒在地——她后来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象。天皇的声音消失了，但是收音机还在继续嗡嗡作响。一位播音员正在播音。他的一句话深深地烙在了相原的脑海中，使她终生难忘：“日本军队将被解除武装并被准许遣返回国。”

这使相原突然间充满了希望。她那被征兵入伍送到“满洲”的丈夫可能就要回来了！那一整天和整个夜晚，她都在祈祷：“请求让我丈夫不要自杀。”日本士兵被灌输了宁死不降的观念，相原害怕在此非常时刻，她丈夫可能会以自杀作为正当的、道义的反应。

此后3年间，相原一直在为丈夫的归来而祈祷。直到3年后她才知道，就在她被从地里召唤来听天皇玉音放送的前一刻，丈夫已经在5天前的一场跟苏联军队的战斗中死掉了。终究，战争已经永远地破坏了她的生活。¹

委婉的投降

数百万聚集在邻里间的收音机前恭听玉音放送的日本人，不是什么现代的“公民”，而是天皇的臣民。一直以来，正是以天皇的名义，他们支持了自己国家与中国和其他同盟国的长期战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那一向是“圣战”。宣布日本投降，44岁的天皇陛下遇到了如何以新的辞令取代这种战争修辞的挑战。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14年前，在他即位的第6年，裕仁天皇默许了帝国军队对中国东三省，即所谓“满洲”的接管。8年前，日本以天皇的名义，发动了对华全面入侵。从那时起，裕仁在公开场合，都是以身穿挂满勋章的最高司令官军服的面貌出现。1941年12月，他颁布了对美国和欧洲各国宣战的诏书。现在，三年零八个月过去了，他的任务不仅是要终止一场失败的战争，而且还不能否定先前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也不得承认本国的暴行，又得以某种方式解脱自己对于多年的侵略



难忘的 1945 年 8 月 15 日的玉音放送，使裕仁天皇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了他的声音。在广播中他宣布日本投降并劝谕民众“忍所不能忍”。

战争所应负的责任。

是裕仁本人首先提出打破先例，直接向他的臣民们发表广播讲话的想法。诏书的内容，直到广播前一天接近午夜时分，才最终敲定。诏书的起草和交付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录制在密谋中进行，并瞒过了那些反对投降的军官们。尽管产生于混乱之中，终战诏书仍然是一份悉心打磨的意识形态精品。²

尽管许多人跟相原一样，理解起天皇的讲话来有困难，天皇发出的 36 讯息（同时通过无线电短波传播到了海外）却迅速被每一个人所知晓。许多像相原村上的东京人那样见多识广的听众，向他们迷茫的同胞们解释着播送内容。播音员们立即以日常口语总结宣言及其要旨。报纸也连忙发行号外，对天皇的诏书加以社论评说。

就像昆虫嵌入琥珀，天皇《终战诏书》的字句很快牢记在了民众意识之中。天皇从未明确地说过“投降”或“战败”。他只是简单地评述“日本战局并未好转，而且世界大势也于我们不利”。他吩咐他的臣民要“忍所不能忍，受所不能受”。这些话在接下来的数月间被无数次征引。

通过这份诏书，天皇尽力去完成不可能的任务：将耻辱的战败宣言，变成对日本的战争行为和他个人崇高道义的再次肯定。诏书的开

篇，天皇重申 1941 年日本向美国宣战时他对臣民的训谕：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日本的生存和亚洲的稳定，不是出于任何侵略目的而干预他国的主权完整。以此为基调，裕仁对那些“为东亚的解放”与日本合作的国家表示深深的歉意。谈到广岛和长崎近期的原子弹爆炸，天皇继续指出，日本投降的决定完全是一种宽宏大量的行为，从残暴的敌人手中拯救人类，使之免于灭绝。“敌人第一次残酷地使用了原子弹来杀戮和残害大量的无辜者，使惨重的人员伤亡难以计数。”他断言，“再继续战争不仅可能导致我们种族的灭绝，而且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毁灭”。通过接受盟军结束战争的要求，天皇宣布，“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本人的意图。

接下去，他以古雅的文辞，将自己塑造为国家苦难的体现者和终极意义上的受害者，将他的人民的牺牲说成是他个人极大的痛苦。当他凝神静思那些死于战争的臣民、他们身后留下的遗族，以及现在全体日本人所面临的非同寻常的苦难，他宣称，“朕五内俱焚”。对于天皇的许多听众来说，这是玉音放送中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有的人承认自己被耻辱

37



珍珠港的美国水兵庆贺日本战败的消息。

感和罪恶感所压倒，未能像天皇期许的那样安居乐业，是他们令天皇悲伤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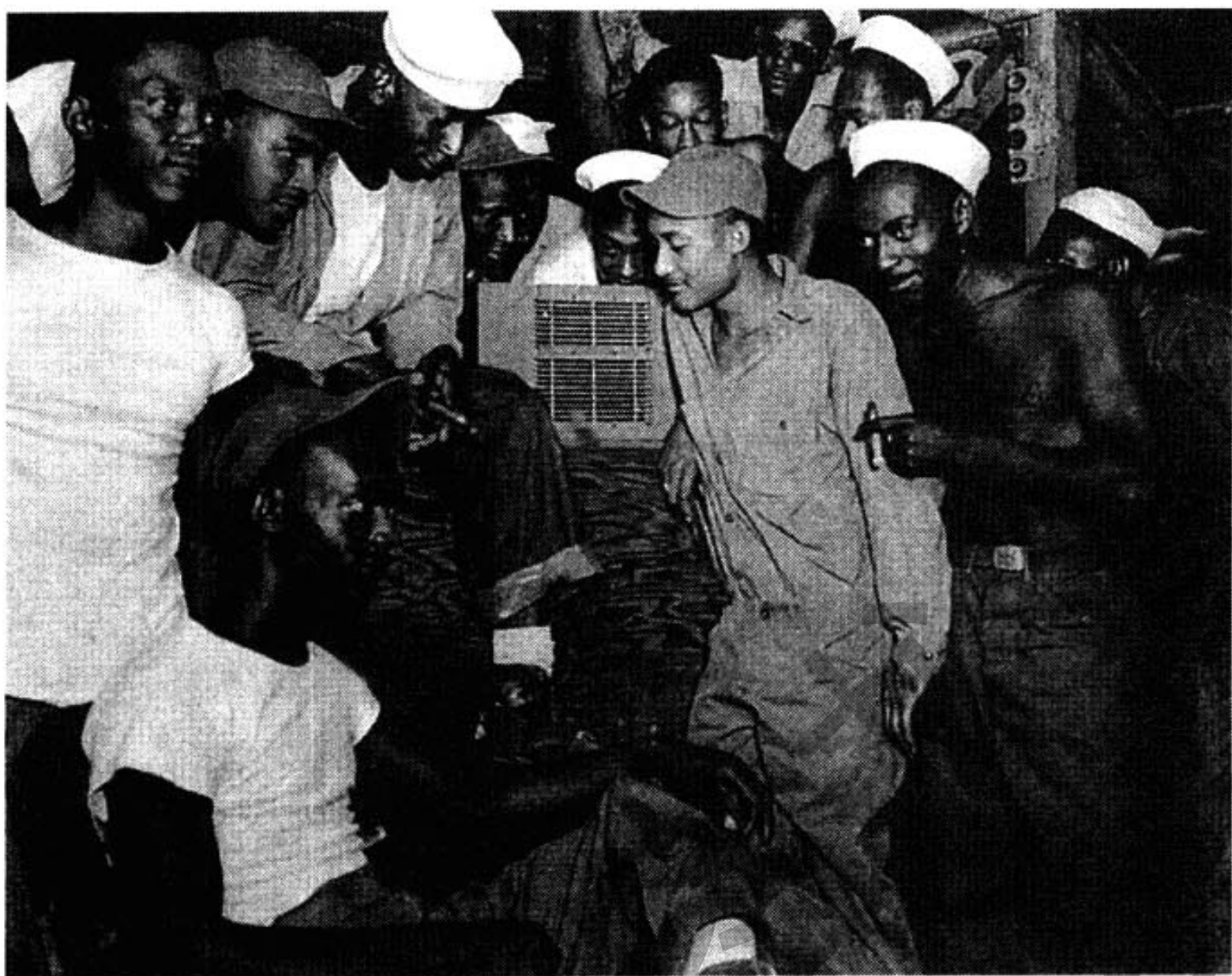
在1945年的8月唤起这样的民众情感，实在是一项巨大的成功。以天皇的名义发动战争的后果，是近300万日本人死亡，更多的人受伤或重病，国家一片焦土瓦砾。而此时天皇忠诚的臣民们，还被期望能够体贴圣意，为不能面对这一切安然活下去从而使天皇苦恼而惴惴不安。这是天皇第一次直接面对公众讲话，所以收效格外显著。或许他真的不仅是他们苦难的象征，还是战争失败最大的牺牲者。毫无疑问，天皇的臣民们必定猜想，此前激励他们战斗和牺牲的皇诏，并非天皇的本意，而是奸佞之臣的断章取义。正像多愁善感的天皇崇拜者们的解释，只有现在，人民才终于听到了天皇真正的声音。正所谓“密云冲破浴天日”。³

尽管天皇一再强调对“朕之忠臣良民”的信任，并保证与他们“休戚与共”，但还是警戒他们不要在战败的混乱和不幸中闹纷争。保持一个大家庭般的团结非常重要，要坚信“神圣国家不灭”，并竭尽全力重建国家，既保持日本的传统，又要与“世界进程和命运”并驾齐驱。

在这些既大胆又小心的言辞背后，隐含着对战后日本社会剧变的深深不安。数月来，天皇一直被这可怕的前景所困扰。天皇的玉音放送，不仅是一场失败战争的正式的终结声明，而且是风雨飘摇之际，维持帝国统治、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紧急战役的开篇宣言。⁴

对于天皇玉音放送的反应千差万别。有些东京居民一路行进到皇宫，静静地站立在一片废墟的都市风景之中。（美国的决策者们排除了将日本皇宫作为轰炸目标，但有一部分建筑还是被不经意地破坏了。）他们跪倒在皇居前的瓦砾上，因未能按照天皇的期望生活而垂首忏悔的照片，后来被当作日本投降瞬间最典型的影像。

实际上，这是带有误导性的影像。聚集在日本皇宫前的人相对来说是少数，而各地的普通百姓流淌的泪水，折射出各种与此相去甚远的群众情绪：苦恼、悔恨、丧亲之痛、蒙受欺骗的愤怒、突然的空虚和目标丧失，甚至是单纯因为不幸和死亡的意外终止而产生的喜悦。天皇裕仁的掌玺大臣和亲密心腹木户幸一，亲眼见证了人们的这种解脱。他在一则日记中记录，的确有人在皇宫前欢呼。他心情复杂地评述说，他们显然是感到如释重负。⁵



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太平洋战区的美国海军特种工兵营。

正如相原的祈祷词所显示的，预料大批的日本人可能会选择死亡而不是战败的耻辱，并非不切实际。在长年的战争中，士兵被禁止投降。他们被告诫说，没有比投降更可耻的了。当战火逐渐蔓延到日本本土，平民们也被灌输了要奋战到死的观念，正如谚语所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在天皇玉音放送之后，选择“玉碎”的人实际上比预想的还要少。有几百人自杀了，其中绝大部分是军官。这一数量仅相当于德国投降时自杀的纳粹军官的数目，而德国从来就没有一种能与日本的自杀殉国相比的疯狂信仰。⁶

实际上，就政府组织来说，8月15日天皇的重要广播之后，最迅速、最显著的行动，莫过于注重实利和自我保全。全国上下的军事官员和文职官僚们，狂乱地焚毁各种文件卷宗，非法地抢夺大量军用物资。尽管天皇的终战宣言使美国结束了空袭，但据说，——这当然有点夸张——几天后东京的上空仍然笼罩在浓烟火海之中。战时燃烧弹的地狱之火，换成了焚烧公文档案的冲天光焰，各界精英们步他们君主的后尘，全力以赴地掩盖他们的战争罪行。

无条件投降

征服者们没有看到这些火光，因为同盟国占领军的第一批先遣队，直到天皇玉音放送之后的两个星期才到达日本。跟他们一起到来的，是一位新的专横的权威统治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被任命为同盟国在日本的最高司令官。9月2日，在东京湾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所举行的壮观仪式上，麦克阿瑟与其他同盟国的9位代表，同日本官员签署了投降协议。

投降仪式充满了象征意味。“密苏里”是亨利·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的家乡，而他有关日本最主要的决议，是在日本的两座城市投放原子弹，并力主执行他的已故前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密苏里”号上飘扬的美国国旗，有一面是19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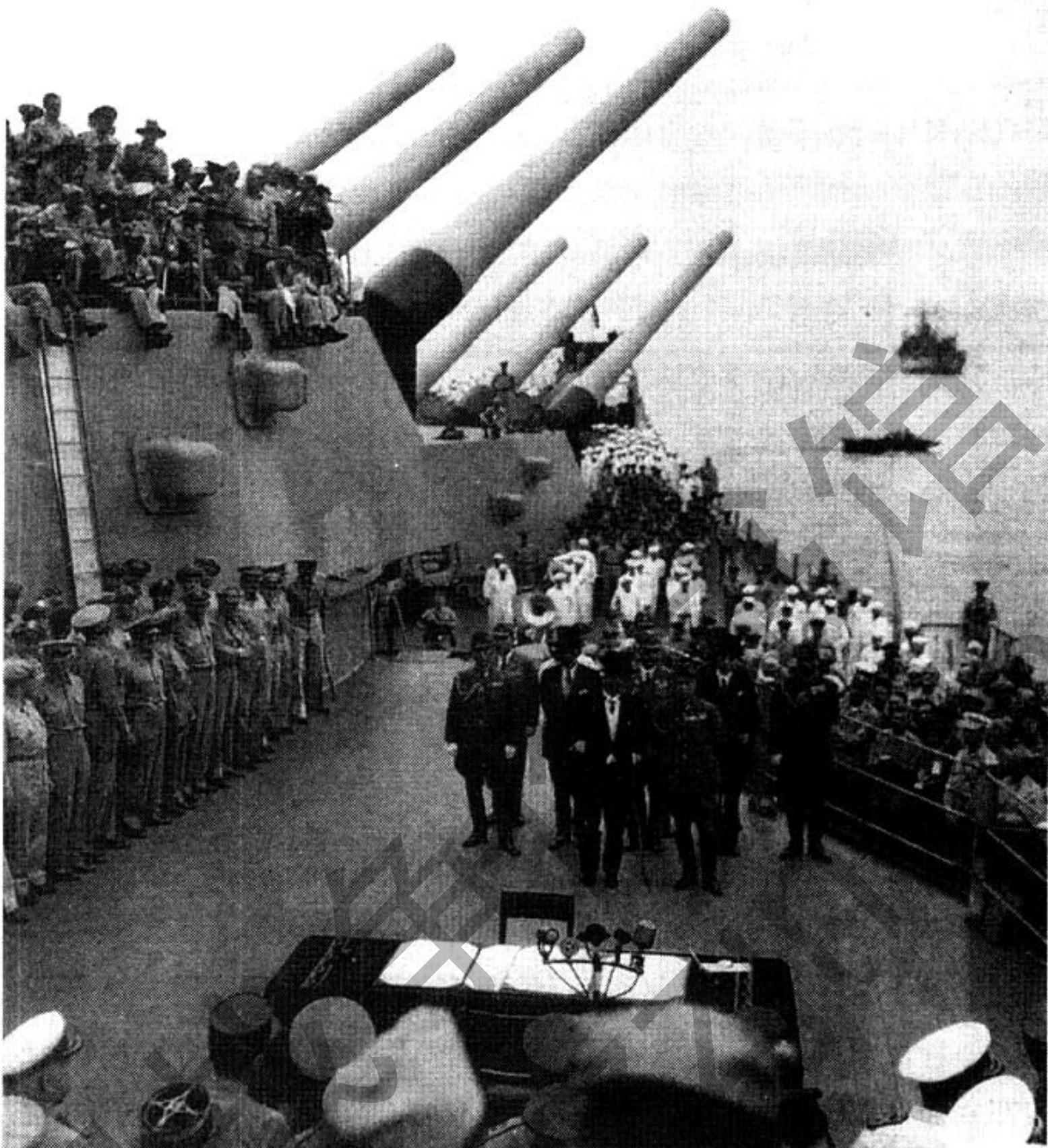


1945年9月，在台湾获释的营养不良的英美战俘。

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时，飘扬在当时白宫顶上的。另一面，是从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美国马里兰州首府）紧急空运来的 31 颗星的美国星条旗，曾经在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的旗舰“波瓦坦”号（*Powhattan*）上使用过。当年佩里的炮舰外交，迫使日本结束了二百多年的封建闭关锁国。1853 年，佩里由帆船和燃煤冒烟的“黑船”组成的小型混合舰队，促使日本走上了最终灾难性的与西方列强争霸世界的历史进程。现在，一百多年光阴荏苒，美国人重又以象征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科技立国的庞大海陆空军队伍卷土重来，以佩里旧日的旗帜炫耀着对日本的惩戒，这是当年的佩里哪怕是在最疯狂的梦境中也想象不出来的。

两位签署投降文件的日本官员，一是梅津美治郎将军，代表日本帝国军方；一是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帝国政府。1932 年，重光葵遭一名抗议日本殖民朝鲜的朝鲜人炸弹袭击，失去了一条腿。他那笨拙的步态，在颠簸的美国军舰甲板上，传达出一种离奇异样的深刻印象，似乎象征着伤残而脆弱的日本。不管怎样，那些来出席签署投降文件的人，站到了那些没有到场的人的位置上：因为天皇没有来参加这样的场合，皇室成员也无一人到场，即使是宫内省也未派员出席。同盟国方面领导人的让步，引起了战胜国和战败国双方阵营观察员们的惊奇。直到战争结束，甚至连露骨地拥护日本皇室的美方官员们，如美国前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也假装天皇将会而且应该亲自签署正式的投降文书。而且甚至在日方已经知晓天皇不必亲自经受这场折磨之后，他们仍然装作将派一位皇室代表，有可能是皇族血亲，来代替天皇签署投降文件。在 9 月 2 日这出伟大的道德审判剧中，天皇被完全免除在外，对日方来说是令人鼓舞的征兆。因为这暗示着，胜利者可能愿意帮助天皇从最终的战争责任中解脱出来。⁷

在“密苏里”号上的演讲中，麦克阿瑟雄辩地谈到了全人类的希望：“一个建立在理解和信任基础之上的更美好的世界将会从过去的流血和屠杀中产生，一个致力于人类尊严和满足人类最宝贵的愿望——自由、宽容和正义——的世界。”他明确地对他的美国同胞指出，“神圣的使命已经完成”，并告诫说，如果这个世界不学着在和平中生存，现代战争的彻底破坏就意味着“世界末日的来临”。当谈到战败国日本时，这位最高司令官宣布，投降的条款委任了胜利方将日本人民从“奴隶状



直到1945年9月2日美国军舰“密苏里”号的正式投降仪式上，失败的重大意味才真正明了。当时日本代表团被团团包围，简直被获胜方同盟国的装备和人员耀武扬威的气势所淹没。

态”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并确保这一民族的精力和能量回到建设的轨道上来，即他所说的“纵向发展而非横向扩张”。这些严厉、庄重而充满希望的话语，以及他宽宏大量的姿态，使得日本领导人又得到了一点 43 儿小小的安慰，他们仍然在紧张地揣摩，胜利者到底想要对他们做些什么。⁸

尽管如此，对绝大多数爱国者来说，投降仪式仍然“意味着灭亡”。正如一位出席“密苏里”号仪式的美国将军所言，“尽管日方代表的表情高深莫测，丝毫也未流露他们的情感”，然而“他们的举止气度是如

此地阴森抑郁，似乎完全意识到了他们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已经付之灰烬，而他们民族的希望和野心业已终结”。⁹ 未来的命运捉摸不定，国家的耻辱才刚刚开始。这个国家已经完全屈服的感觉，被投降仪式上的戏剧化场景强化了。帝国的海军早就被摧毁了。除了几千架摇摇欲坠的以备自杀袭击的飞机之外，日本的空军力量——不仅是战机，而且包括训练有素的飞行员——实际上也不存在了。日本的商船也都躺在了海底。几乎全国所有的重要城市都遭到过空袭，天皇数百万的忠诚臣民无家可归。战败的帝国军队，星散在亚洲各地和太平洋的众多岛屿上。成百万活下来的士兵正忍饥挨饿、满身伤病、士气丧尽。然而东京湾挤满了几百艘强大的、闪闪发亮的美国战舰。在某些戏剧性的时刻，引擎轰鸣，天空会几乎一下子被大约 400 架耀眼的 B-29 超级轰炸机和 1500 架护卫的海军战斗机完全遮蔽。帝国的土地被一波又一波身强体壮、装备精良、神气自信的登陆美国大兵所褻渎。这支占领军的数量，很快就超过了 25 万人。一个在 1940 年庆祝过它神话传说中的“皇纪两千六百年”并自豪于从未被入侵的国家，就要被白人占领了。

在日本人眼中，对 1945 年 9 月 2 日无法磨灭的印象，是西方——实质上就是美国——格外的富裕强大，而日本则是不可思议的贫困虚弱。这是一种简单的观察，但它承载了巨大的政治含义。东京湾的一幕，就发生在紧接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之后，提供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教训。那就是在美国式民主之下，可能达到怎样的物质实力和富足。尽管理解这个关于财富与力量的民主等式需要一点儿时间，但明白日本已经彻底战败却几乎不需要什么时间。投降仪式 9 天后，麦克阿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评述说，日本已经降到了“四等国家”的地位，——这种对现实状况的露骨评价，足以使天皇以降的每一位日本领导人感到痛彻心肺。自从佩里准将强迫日本敞开门户以来，日本的统治者就执迷于成为“一等国家”。事实上，正是出于自己“一等国家”的地位不被承认的恐惧，才激起了日本朝野上下同呼吸共命运，最终向西方宣战。包括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一些人断然宣称，假使不能在亚洲建立高枕无忧的绝对统治权，日本就会被降级到“二等”或是“三等”国家的地位。就像一道被重新撕裂的伤口，“四等国家”的说法，立即成了战后的流行语。¹⁰ 这之后不久，麦克阿瑟又以更惊人的口气说到日本的处境，使人忆起《圣

经·旧约》全书中愤怒的神。谈到日本军队被遣散的问题，麦克阿瑟宣称“他们被彻底打败和威吓住了，在投降加于他们国家的严重惩罚面前瑟瑟发抖，这是对他们国家深重的战争罪孽的报应”。¹¹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胜利者继续为这个国家的破坏程度而感到震惊。10月中旬，在呈交杜鲁门总统的一份概括麦克阿瑟和他的助手们的谈话的备忘录中，总统特使小埃德温·卓克（Edwin Jocke, Jr.）报告说，“现驻东京的美国官员们惊奇于这样的事实，日本竟然能够抵抗那么久”。实际上，经济的混乱是如此严重，他补充道，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原子弹爆炸“是被日本人抓住以结束战争的口实，事实上只是加速投降数天而已”。卓克接下来指出，“日本大城市的整个经济结构已经被摧毁。东京700万人口中的500万业已离开了这座毁坏的城市”。¹²稍后从华盛顿派来了调查团，由享有盛誉的联邦战略轰炸调查团分析专家带队，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投降前对日本继续战争的实力的估计，被过分夸大了。¹³这当然不过是事后的推论，但是它反映出当时普遍的评价，即日本在战争结束时的虚弱，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外任何人的想象，也超出了日本国内任何人承认的程度。

实质上，以后几年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日本彻底战败的背景下展开的。绝望、愤世嫉俗和投机主义，在这样的氛围中生根蔓延。而恢复力、创造力和一种只有在亲历一个旧世界的毁灭和憧憬新世界的诞生的人们身上出现的理想主义精神，也得到了奇迹般的张扬。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乎没有人有精力、想象力或意愿，去奢谈他 45 们在执行天皇的圣战过程中曾经牺牲的那些生命了。

战败的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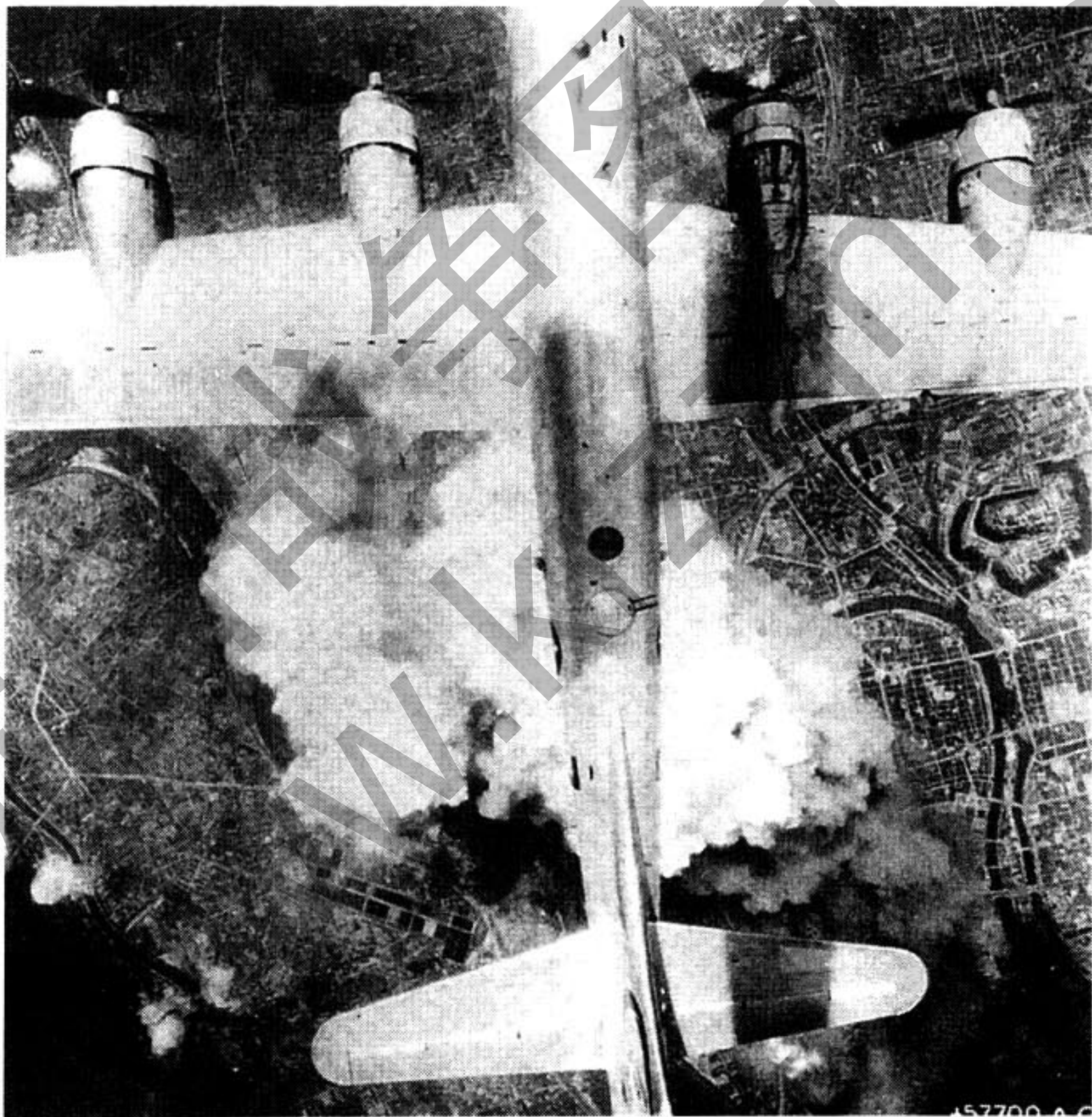
战争的创伤是难以精确计算的。即便出动庞大的机构和部门来计算人员伤亡总数和估计物质毁坏的程度，其结果仍然是典型的大杂烩，精确得难以置信的数字下掩盖着大面积的模糊。在战败国日本，用了几年时间才计算出普遍认可的这次失败的战争所花费的代价。¹⁴

经常被引用的军队死亡人数，截至投降时大约是174万，这一数字可能相对准确。另一方面，一旦计入在空袭中死亡的平民人数，评估数字就相当混乱了。如果将1945年8月15日之后日本本土以外与战争相

关的军队和平民死亡数字计算在内的话，情形就会变得更加不明朗。日本战后的历届政府，都倾向于对此棘手问题采取回避态度。总计可能至少 270 万军人和平民死于战争，大略相当于日本 1941 年 7400 万人口总数的 3% 到 4%。另有数百万人受伤、患病或严重营养不良。1945 年，接近 450 万的复员士兵被认定为伤病，最终大约有 30 万人领到了伤残抚恤金。¹⁵

对物质损失所作的大清算显示，同盟国对日本本土的海战和空袭战，毁灭了日本整个国家大约 1/4 的财富。其中包括 4/5 的船只，1/3 的机器设备，1/4 的运输工具和机动车辆。麦克阿瑟将军的“SCAP”机关（SCAP 是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首字母缩写，通常用来指代麦克阿

46



日本投降之前，超过 60 个城市在空袭中被严重炸毁。这张美国军事照片，俯拍的是 1945 年 6 月在大阪上空执行轰炸任务的一架 B-29 超级轰炸机。

瑟的司令部) 将全部代价估得更高, 1946 年初的计算是, 日本“损失了总体财富的 1/3, 以及全部潜在收入的 1/3 到 1/2”。农村的生活水平降到了大体相当于战前水平的 65%, 城镇生活水平则降到了 35%。¹⁶

包括广岛和长崎在内的 66 个主要城市被严重炸毁, 破坏了这些城市总计 40% 的地区, 至少大约 30% 的人口无家可归。在最大的都市东京, 65% 的住宅被摧毁。在全国的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大阪和名古屋, 这一数据分别是 57% 和 89%。第一支到达日本的美国分遣队, 尤其是那些经历了从横滨到东京的几个小时旅程的队员, 对沿途随处可见的城市废墟, 如果不感到震惊的话, 也至少无一例外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位进入东京的外国记者拉塞尔·布莱恩斯 (Russell Brines) 报道说, “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只有孤零零的一些建筑矗立在平地上——公共澡堂的烟囱、笨重的仓库, 偶尔还有铁门紧锁的低矮建筑”。¹⁷ 从这片被占领的土地上第一次拍摄的照片和电影胶片, 捕捉着这些无尽的残破的城市街景, 传达给万里之外的美国观众, 而他们从未真正了解烧毁的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



47

第一批进入战败国日本的胜利者, 震惊于他们面前城市的破坏之惨烈。这是当时隅田川边的东京闹市区的俯瞰图。

然而，即使是置身于这些大面积毁坏的城市景象中，征服者们仍然发现了他们选择性轰炸政策的奇特证据。譬如，首都的大片贫穷的民宅、小店铺以及工厂被摧毁了，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富人区住宅却保留了下来，以备占领军的大批军官们居住。东京的金融区，大部分完整无损，将很快成为“小美国”地区——麦克阿瑟将军的总部所在地。没被破坏的，还有战争末期驻扎了大多数帝国军事机构的建筑。饶有讽刺意味的是，胜利者随后将此作为了审判日本首脑战争罪行之地。全国的铁路也仍然能够或多或少地有效运转。例如，东京的居民们曾直接乘火车去遥远的广岛，探视他们的亲属是否在原子弹爆炸中活了下来。在被炸毁的贫民区之外，包括电力和供水在内的绝大多数设施，仍然运转正常。不管有意还是无意，美国的轰炸政策，至少在大城市，曾经倾向于重新强化现存的财富等级秩序。¹⁸

当天皇告诉他的臣民从前的战斗和牺牲都是徒劳的时候，接近 900 万人已无家可归。正如一位美国人描述的情景，“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很多家庭挤在摇摇欲坠的小席棚里，有的试图睡在过道或地铁站台上，甚至人行道上。公司雇员睡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老师们睡在教室里”——当

48



1945 年 9 月，一个日本士兵走在被夷平的广岛土地上。

然，假使他们足够幸运，仍然有办公室或教室可睡的话。每个主要城市的街道上人都人满为患：复员的士兵、战争寡妇、孤儿、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他们中绝大多数只想着如何能够不挨饿而已。¹⁹然而，相对说来，他们这些人仍然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家。

或者……归国？

战败之后，约有 650 万日本人滞留在亚洲、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地区。其中大约有 350 万人是陆海军士兵。其余的是平民，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这是一群数量众多而且被普遍忘却了的中低阶层的人们，他们曾被遣往海外协助建立强盛的帝国势力范围。在战争结束时，约 260 万日本人滞留中国，其中 110 万分散在“满洲”地区。此外，近 60 万军队在千岛群岛和满洲南部的大连湾旅顺口一带放下武器。超过 50 万人滞留台湾，90 万人滞留朝鲜，此前中国的台湾地区和朝鲜曾分别于 1895



49

1945 年 9 月，广岛临时医院里的原爆幸存者。床褥上落满了苍蝇，一位妇女正盯着被子下面她那受伤的婴儿。



战后的数年间，许多城市居民继续在这样的棚户区中竭力维持艰难的生计。

年和 1910 年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在战争结束时，东南亚和菲律宾群岛的日本人接近 90 万，绝大多数是军事人员。此外，还有数十万的天皇残余部队被困于太平洋诸岛屿。²⁰

自然，所有这些都盼望快点回国，他们的亲人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然而对许多人来说，回国需要几年而不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注定会死去，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祖国。对这好几百万人来说，投降，只不过标志着人生更加动荡不安和残酷阶段的开始。他们成了被战争蹂躏的、“解放了的”亚洲的混乱状况的牺牲品，成了传染病肆虐的牺牲品，以及胜利的盟军的虐待对象。1946 年 9 月，天皇广播之后又过了一年多，超过 200 万的日本人仍然未被遣返回国，而且政府承认大约还有 54 万人下落不明。²¹

在“二战”数不尽的史诗般的悲剧中，这些日本人的命运是被忽略的一章。仅在“满洲”，据估计就有 179000 名日本平民和 66000 名日本军人，在投降条约签订之后的混乱和严冬中死亡。²² 在北中国的“满洲”和其他地方仓皇离去的日本人，通常只力所能及地带一点东西，也就是年幼的孩子、随身物品和很快就会吃完的食物。所有的财产都丢弃了。

51 许多难民走投无路，不得不将最小的孩子留给贫穷的中国农民家庭，孤注一掷地希望，被遗弃的孩子也许更能有机会活下来。²³

即使正常地踏上了归国的路途，也不能保证立即安全地回国。疾病在一队队的归国人群中蔓延，因而归国的行程会由于医学体检、免疫接种，甚至是隔离检疫等的需要而拖延。就这方面而言，1946年春夏，形势尤其严峻。4月份，从中国腹地启程的归国者被天花的流行阻挡了行程，5月是斑疹伤寒症的发作，6月份则是霍乱大流行。朝鲜南部和印度支那北部、“满洲”地区也分别于5月和8月爆发了霍乱。²⁴

对于所有战区的日本现役军人来说，归国行程的延迟，往往是因为当地的盟军首领选择利用这些战俘来为战后的特殊用途服务所致。直到1946年末，美国扣留了将近70000名投降的日本兵做劳工，用于逐步淘汰设在菲律宾群岛、冲绳岛和太平洋海域的战时设施。英军方面，负责从南亚和东南亚遣返大约75万日军回国，在这些欧洲列强将日本侵略者业已驱逐的区域，他们扣留大量日本战俘来建设工程，毫不掩饰重建自己殖民权威的意图。1946年中期，他们宣布将扣留113500名战俘在当地劳动，直到1947年的某时。后来，其中约有13500人被移交给了荷兰，用于重新加强对以前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统治。在马来亚和缅甸，最后一批日本战俘直到1947年的10月才被英军放行。²⁵

被中国军队俘虏并被迫在中国的内战中为国共双方工作或打仗的日本俘虏，总数不明。据报道，投降之后一年多，大约68000名被关押在“满洲”的日本人仍然在为中国的军队效力，绝大多数在共产党一方。国民党政府方面，在1946年的大部分时间，推迟遣返了超过50000名具有实用技能的日本人。直到1949年4月共产党胜利前夕，相信仍然有超过60000名日本人滞留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²⁶

对大批的投降军队扣留时间最长、虐待最严重的是苏联方面。苏军于8月8日天皇广播前一星期参战，并在“满洲”和朝鲜北部接受了日军的投降。美国和日本权威人士估计，大约有160万到170万日本人落入苏军之手。而且很快，事实证明，很多人被利用来弥补苏联因战争和斯大林肃反运动所造成的人力不足。苏联释放的第一批战俘直到1946年12月才回到日本。到1947年末，总共有62.5万人被正式遣送回国。同期，约有29.4万在朝鲜北部投降的日本人，通过“非正常”途径在美国控制的半岛南部港口登陆。第二年的5月到12月间，又有大约30万人被允许回国。此后归国的流程再次中断，公布的理由据说是因为恶

劣的气候状况。

对苏联的普遍敌意，可回溯至上个世纪之初。早在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当时沙皇俄国与日本帝国在东北亚就是领土扩张的竞争对手。遣返进程折磨人般拖延的状况，以及苏联方面不愿提供战俘人数和身份确切信息的做法，加深了这种仇恨情绪。到了1948年，还有一点也变得明确无误：苏联拖延遣返是为了对战俘们进行强化教育，以便让他们回国后为宣传共产主义做贡献。²⁷

1949年春天，在占领军领导人的一再敦促下，苏联宣布仅剩95000名战俘，他们将全部在当年底遣返。依据美国和日本的统计，确切数字应当在40万左右。突然之间，超过30万日本人的去向成谜。四十多年后，苏联终于透露了大约46000名已知被埋葬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姓名。全部人数从未能够查实。²⁸

这些数据的混乱——数十万士兵、水手和平民就这样在海外消失——暗示了“战争结束”的正式日期，本质上来说对许多日本人毫无意义。年复一年，妻子们、孩子们和父母们等待着亲人的回还，就像相原那样，经常是终于盼来了消息，却是亲人已故的噩耗。或者，更糟

53



1950年2月，战争结束四年半之后，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由佛教日莲宗发起的集会上，妇女和儿童为仍被苏联扣留的战俘们的回归而祈祷。

的是，从此音信杳无。1950年，日本最流行的家庭连载漫画《サザエさん》（《阿螺》），还把一个男孩可怜地等待他的父亲从“苏联”归来作为主题。²⁹

那年的4月，麦克阿瑟将军接到了来自滋贺县12万人的不同寻常的请愿，这些人全都是失踪士兵的亲属。他们还送上了一件非凡的礼物：一幅费时8个月绣成的麦克阿瑟的刺绣肖像，每个请求者都在上面绣了一针。这件惊人的礼物的灵感，暗含了战争年代亲人的一种象征性的祝福行为——送给士兵们腹卷（腹带，肚兜），由一千个人每人缝一针。制作和佩戴“千人针の腹卷”，是在海外作战的男人与他们家乡的亲人，尤其是家里的女人们之间亲情的表现。这件礼物附上的短信，感谢最高司令官对确保上百万日本人遣返的“无尽同情”，并恳请他继续为仍然滞留海外的人尽力。³⁰日本投降四年半之后，大量民众仍然时时处于悲痛和不安之中，怀着他们破碎的人生可能重圆的憧憬。

难民

54

从后勤运输的角度看，遣返过程取得了震撼人心的成就。从1945年10月1日到1946年12月31日，大约200艘自由轮、美国军方出借的登陆舰，以及日本曾引以为豪的舰队的残余船只，运送超过510万日本人回到了祖国。另有100万人终于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则是在1947年。³¹与此同时，“反向的归国”也开始起步，即遣返战争中滞留在日本的外国人。胜利者的首要问题，当然是确保在日战俘的获释。这些分散关押在100多个集中营里的战俘们营养不良，有的还得了肺结核。一些人，比如在“大船收容所”里的战俘们，受到了严重虐待。美国人还获悉了在日本本土针对战俘的极端暴行，包括在九州帝国大学进行的活体解剖。到1945年10月31日，总共有31617名美国战俘获释，并经由马尼拉回国，在途中有187人转入医院治疗。³²

到目前为止，在日数量最多的外国人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大多数是应征入伍担任重体力劳动的朝鲜人。到投降时，约有135万常驻日本的朝鲜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想离去。到1946年的第一周，已经有63万朝鲜人被遣返。那年年底，遣返总数上升到93万人。与此同时，一些在他们本国遭遇混乱和艰辛的朝鲜人，分别进入美国和苏联的占领地带，

企图重新进入日本。另有一些海外的朝鲜人，包括很多在日本军队中服过役的人，选择遣返日本，而非朝鲜。遣返在日的亚洲人，还包括遣返超过 31000 名中国战俘与合作者回国，这一数目，与当年遣往台湾的殖民居民的数量大体相等。³³

在战争孤注一掷的最后阶段，日本的领导人包括天皇本人，选择了一场徒劳但却异常惨烈的战役中牺牲冲绳，企图以此阻止盟军攻入日本本岛。从 1945 年 4 月到 6 月的冲绳战役中，超过一万美军丧生。帝国部队超过 11 万人实质上被消灭，大约 1/3 的当地人口——大概有 15 万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杀。遣返，对冲绳人来说，只是标志着新的痛苦阶段的开始。因为在那场战役之前，大约有 16 万冲绳岛居民已经撤退到了

55



1946 年 12 月，日本投降 16 个月之后，在日本平民由“满洲”归国途中成为孤儿的孩子们到达东京的品川车站。照片右首的孩子，脖子上挂着白色肩带，里面放着她的家人们的骨灰盒。

日本本岛。尽管他们渴望能尽快返乡，但这是不可能的。冲绳岛被毁坏得如此严重，甚至已经无法为当地大幅度减少的现有人口提供足够的食物和住处。于是，在日本本岛的冲绳人，成为了另一群难民，被迫住在日本的难民营中，承受不能返家的痛苦和辛酸。³⁴

当时位于浦贺港的鸭居收容所的记录，描绘出赤裸裸的混乱与绝望 56 的状况。此收容所于 1945 年 11 月开始接受从太平洋地区回国的平民，设计安置人数为 1300 人，但很快就住进了 3 倍的难民，其中半数儿童。难民营的管理，无力避免营养不良问题。每日典型的菜单，包括每天定量供应少许混合的大米和小麦，早餐是酱汤，午餐是煮白菜，晚上煮萝卜白菜当晚餐。许多归国者无处可去。偷盗是常有的事，许多男人靠赌博消耗精力。记者仓光俊夫，在 1946 年 1 月写道：共有 4 位医生、18 名看护妇和 4 名医疗助手为这个中心服务，负责尽快将重病号分别送往附近的 6 所医院中。尽管如此，每天仍有 15 人到 20 人由于营养不良或其他原因死于收容所中。指派的殡葬队来不及将尸体运往火葬场，经常不得不将早已咽气的人搁置一边，直至尸身变得强直僵硬。³⁵

1946 年 12 月，仓光记录了他与渡边千鹤子的一次对话。渡边千鹤子是个 7 岁的小女孩，是从“满洲”回国的第一批孤儿中的一员。回国的 36 名儿童，从 4 岁到 12 岁不等，其中 23 人，包括千鹤子，被立即送进了医院。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生着疥疮，并且营养不良。有 4 个孩子得了严重的肺结核。渡边千鹤子的一张照片，曾经出现在许多报道孤儿回国的报纸上。她被挑选出来，是因为她回国的时候，脖子上的肩带下边挂着当时常见的白色骨灰盒。仓光找到小女孩的时候，她正端坐在一张成人尺寸的大床上，骨灰盒就在旁边的搁板上，跟一个小洋娃娃放在一起。他记下了跟小女孩的几句对话：

“你爸爸死在哪儿？”

“奉天。”

“妈妈呢？”

“葫芦岛。”

“妹妹贞子呢？”

“佐世保。”



在战败导致的长期混乱中，许多旧军人乃至平民百姓下落不明。这是投降 10 个月后，一位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查看失踪者亲友张贴的寻人启事。

这些地名标志着千鹤子从“满洲”归来的漫长旅途中的各个阶段。按照日本习俗，因为信仰佛教，所以人死后要授佛教徒的戒名。因为架上的骨灰盒上只有一个戒名，仓光说不上来，里面到底盛放的是千鹤子父亲、母亲还是妹妹的骨灰，或者就是他们三人的骨灰掺和在了一起。³⁶

在日本投降一年后，虽然身揣亲人骨灰的孩子的景象还有新闻价值，但海外归来的退伍士兵，携带死去战友的骨灰交还幸存亲人的场面，则是司空见惯了。对于归国的平民，骨灰盒也常常出现在他们少得可怜58 的随身行李之列。然而，即便是死人的遗骨，有时也未必有明确的归宿。1946 年 8 月 1 日，据报道在浦贺港靠岸的遣返船冰川丸，带回了 7000 具无人认领的骨灰盒。³⁷

许多成年人，数年后从海外归来，发现自己的家已经无迹可寻。城市中的街区整个被夷为平地。父母妻子在空袭中被炸死或者疏散到了乡下。全国各地，到处是临时的布告牌，贴满手写的寻找失散家人的启

事，或是提供张贴者本人的讯息。这并不仅仅是投降之后几个月内的现象。自1946年1月始，一档叫做“复员者消息”的广播节目开播，提供即将遣返回国人员的姓名、船期和登陆口岸的信息。1946年6月，当证明这些做法还不够时，又开播了一档“寻人”栏目。电台几乎立即就被每天四五百封的读者来信和数十通电话询问淹没了。到8月份，广播时间增加到每天两次，每周五天。有段时间，节目中有一个特别的单元“我是谁？”，专门为迷失家园的归国老兵进行咨询。“寻人”节目相当成功地完成了它的使命。起初，大约40%到50%的广播问询都得到了回复，直到1950年，这个节目还在继续清理相当数量人员的下落或是死亡声明。“寻人”广播一直到1962年3月31日才结束。³⁸

受歧视的老兵

当从苏联遣返的战俘开始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时候，他们受到指责已经被洗脑，是故意挑起“军官和士兵之间的阶级仇恨”。³⁹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许多从苏联以外的地方归来的退伍兵，也对曾经领导他们战斗的军官既愤激又轻蔑。这种情况在战争狂热而徒劳的最后阶段仍被命令血战到底的士兵中尤其突出。团队的凝聚力和军队的等级秩序，并没有像宣传的那样，在理想化的概念“忠诚”与“和睦”上建立起来，而是建立在独裁专制、逐级压迫的高压政策的基础上。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上级军官普遍赢得的不是尊敬而是恐惧，而战败则释放了一直深深压抑着的怨恨。在极端的案例中，这种仇恨甚至导致了对前任军官的谋杀。

投降之后，这些情绪第一次得到公开宣泄。1946年5月，一位老兵给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朝日新闻》写了一封典型的诉苦信，回忆他和他的战友们在太平洋的一个岛屿上，忍受“地狱般的饥饿”和军官对他们的虐待。他诉说士兵饿死的比例要远远高出军官，并质问如何⁵⁹才能使战友的亡灵安息，因为他们实际上是被领导者的暴政杀死的。他引用了古代武士的谚语“拉上一个垫背的去阴间”，这谚语本来是指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意思。他说，他的绝大部分战友，死的时候不是希望与敌人，而是与自己的军官同归于尽。⁴⁰

几个月后，《朝日新闻》关于一位施虐军官在战后被士兵私刑处死

的报道，引起了18位读者的回应。只有两人除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谋杀并讲述了自己在军中亲眼所见的残暴和腐败。一位在朝鲜服役的士兵，描述了军官在当地玩女人和酗酒的事。一名水兵痛苦地回忆起他们如何鞭打自己的一位战友。另一位老兵忏悔说，他经常想袭击他的军官，但怕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不幸的后果，只好自己忍着。甚至那两封批评私刑事件的来信，也采取了辩护的姿态。两封来信都声言，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是坏的。⁴¹

这样的坦承，在投降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它暴露出战时的宣传，所谓“一亿一心”是多么昏聩不明。即使是刚毅冷酷的老兵，也往往为归国后的遭遇震惊不已。那些以欢送会和壮行酒打发他们上战场的左邻右舍们，那些给他们寄慰问袋和“千人针の腹卷”的乡里乡亲们，通常并不欢迎他们的归来。说到底，他们是失败者。他们邋邋落魄的样子，看上去像是对充斥战时宣传的英雄理想和英雄形象的嘲弄。

另外，战败之后纲纪废弛，驻扎在日本本土的军人纷纷逃离守地。有警方的目击者提供，不少人步履踉跄地将抢来的军用物资尽可能多地扛回家，仿佛是“迷途知返”的本能所驱使。即使是神风特攻队的幸存者，也参与了疯狂的物资掠夺。他们原本准备在战争结束时起飞，以完成他们单程的自杀式使命。有一位飞行员以此来迎接战败：他将飞机装满军需日用品，飞到他家附近的一个飞机场，把战利品装车运回家，然后再返回将飞机引爆。天皇忠诚的陆海军官兵们，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利己主义和离心离德的最坏典型。军官们和士兵们都趁火打劫，有时是大规模的抢掠。警方报告担忧，公众的厌恶会上升为对军事和行政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不满和憎恶”，甚至是普遍的“对军人的仇恨”。⁴²

60 有时，甚至仅仅是一名退伍兵还活着的意外事实，就可能引起恐慌。一些老兵归来后发现，他们在很久以前就被宣布了死亡。他们的葬礼已经举行过，墓碑也立起来了。按照当时讽刺的说法，他们成了“活着的英灵”。⁴³对悲伤的亲人们来说，他们的死而复活，可能令人又喜又惊，乃至绝望。有不少这样的故事流传着：丈夫历经数年、饱尝艰辛回到家，却发现妻子已经再嫁他人，通常是自己的兄弟或密友。

对于绝大多数原陆海军士兵来说，最大的震撼，莫过于发现自己历经千难万险回到祖国，却被当作贱民对待。到1946年归国潮蜂拥而至之

时，国内的民众已经持续了解到帝国部队在中国、东南亚、菲律宾，乃至对盟军战俘令人发指的暴行。结果，许多退役军人发现，他们不仅被看作是没能完成使命的失败的群体，而且被假定为参与了不可告人的坏事的个体来对待。在老兵们写给媒体的信中，反复提到熟人和陌生人共同投来的谴责的目光。有些老兵开诚布公地表达了对自己犯罪行为的悔恨。另外的人则声言自己的清白，抗议把他们当作战争罪犯看待的不公。他们辩护说，公众必须区分士兵或军人与“军阀”的区别，后者才应最终为战争及其行为负责。

1946年6月9日，发表在《朝日新闻》上的一封匿名信，记述了这种“还乡”的冷遇：

5月20日，我从南方地区复员回到日本。我的家烧毁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失踪了。物价太高，我仅有的一点钱很快就花光了，我是一个可怜的家伙。没有人肯对我说句好话。人们甚至向我投来敌视的目光。没有工作、受尽折磨，我被魔鬼迷住了心窍。

这“魔鬼”指的是他想犯罪的冲动。写信的人接下来讲述，他如何在黑暗的街道上与一位年轻人搭茬儿，企图抢劫他，却发现攻击的是一位下班的警察。最终，他的故事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结局。警察没有逮捕他，而是给了他一百日元和自己的一些衣物，激励他相信自己、克服困难。尽管写信的人仍然没有妻子、孩子、家庭、工作或金钱，他的信无疑是此后将正直做人的公开誓言。⁴⁴

污名化的受害者

日本战争的许多最悲惨的受害者，现在成了这个国家新的被放逐者。尽管有怜惜病弱者的温和的佛教传统，尽管有儒教关于社会上下尊卑之间相互义务的说教，尽管有所谓天皇治下的日本人是“一家”的大日本帝国的老生常谈，对于那些没有归属于“适当的”社会集团的人来说，日本是一个冷酷的、不友善的所在。这里没有对陌生人尽义务的传统，没有不求回报的博爱，没有对遭受不幸的人的宽容，哪怕是发自内心的同情（与暂时的感伤相对而言）。

当然，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其冷酷的一面。但在战争结束时期的日本，这一现象尤其突出。所有新出现的“不合时宜”的人群，无一例外都感到了被侮辱的痛楚。他们，包括受辐射玷污的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还有战争孤儿和街头流浪儿，被摒弃在“正常”社会之外自生自灭。至于战争未亡人，尤其是那些家贫者，在这个自来歧视寡妇的社会中，就更加难以生存。无家可归的退伍兵或是其他被抛弃的人，挤满了东京上野公园之类的公共场所。

公众通常回避谈论受战争打击患上精神疾病的退役军人问题。尽管历史上有几位天皇和幕府将军也被认为精神错乱，精神疾患却一直是个禁忌话题。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通常被幽闭于隐蔽之处或暗室之中。身体的残障，也会引起公众同样的反感。许多残废的老兵无法可想，于是挑战这些禁忌，穿戴整洁在公共场合求乞，公然展示他们身体的残缺，

62



1946 年，东京上野车站附近的流浪儿。

确切地说，是展示他们的痛苦和酸辛。在东京，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还有这样的流浪者在公共场合出没。另一些人则由于回国后受到的冷遇，放弃了求生的努力。有一位在写给报社的信中说，“我们的生存被损害，伤病的老兵们被遗忘了”。信是从一所疗养院发出的，写信的人讲述了他的康复病友们由于绝望而自杀，信的结尾宣布说，“我自己五分钟后也要上吊了”。⁴⁵

由于战争失败，又有身心残缺，残疾退伍军人受到了双倍的歧视。同样，一旦公众的感情宣泄过后，年幼的战争受害者们也被推进了深渊。战争孤儿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们，几乎就被定义成了“不良”儿童。他们被迫在大街上讨生活，被当作无可救药的小罪犯来对待。战争结束后许久，政府不仅没有拿出有效的措施来关心这些儿童，甚至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有力关注。1946年6月，厚生省估计全国大约有4000名战争孤儿。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统计，战争孤儿和无家可归的流浪儿⁶³合计为123510名。其中，28248人在空袭中失去了父母，11351人在艰难的遣返途中成为孤儿或失去与父母的联系。2640人确认为被“抛弃”。令人吃惊的是，另有81266人是在战争结束时的骚乱中丧失父母，或与父母走失的。⁴⁶

这些孩子许多住在火车站、高架桥和铁路桥底，以及废弃的建筑中。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生存——擦皮鞋、卖报纸、偷钱包、捡烟头、非法贩卖粮食配给券，还有乞讨。一些偷钱包的男孩子被叫做“喀嚓响的家伙”。（显然，“喀嚓”是硬币碰撞声的拟音词。）一些十几岁的女孩子想当然地以卖淫为生。有少数流浪儿，的确凭借他们的智慧过得不错。1947年4月，在东京警方的一次行动中，围捕了285名流浪儿，其中只有76人没有任何营生。当时，大学学历的白领公务员的平均月工资，大约为1240日元。而流浪儿中有19人平均每天能挣高达100日元，另有67人每天挣30到50日元。⁴⁷

投降初期最时髦的一句口号，是向往日本成为一个“文化国家”。1946年10月，一位出身贫寒的有名望的小说家林芙美子，在一份大众杂志上讨论说，没有任何对孤儿和流浪儿的困境如此漠视的国家，能够自称是有文化教养的国家。⁴⁸两年后，一位因人道主义受到尊敬的著名作家大佛次郎，坦率地就同一问题深入探讨。他写道，一位英国的熟人质

问，为什么日本人对他们街头的流浪儿无所作为。他对此的第一反应是缺乏财政来源，但经过反省，他认识到原因是缺乏真诚。他在文章结尾写道，事实上只是，日本人这个民族，缺乏对陌生人的爱心。他自己也不例外。说实话，他只得承认自己不愿意接受这些肮脏调皮的孩子，不愿费心去教导他们。大佛思考说，或许当谈到爱的时候，日本人比别的民族浅薄。⁴⁹

无家可归的孩子一般会被驱赶在一起，像家畜一样被装上卡车——这可不是个牵强附会的比喻。直接负责围捕工作的警察或市政官员们，通常会大声地清点人数。他们不是报一人、两人……而是像数动物那样喊一只、两只……收容中心往往实行军事独裁管制，经常搞体罚，甚至不给有些男孩穿衣服，以防止他们逃跑。在有些地区，这样的孩子从孤儿院进入正常的教育体系，常常需要漫长的时间。即使他们重返主流社会之后，仍然会因为是无父无母的“收容所来的家伙”而饱受歧视。⁵⁰

战争未亡人，虽然在公众舆论中享有荣光，但也经常受到忽视和歧视。除非家境富裕，她们都得想方设法，在艰难的时世中养活自己和孩子们。军队的津贴早已停止发放，战时工厂的工作已被取消，成千上万从海外归来的男人，以及从其他倒闭的战时工厂解雇的工人，正在争夺稀缺的工作岗位。那些有勇气和力量面对公众的战争寡妇们，在媒体上吐露了她们共同的心声。一位农村妇女，她的丈夫放弃家族的生意去“为天皇打仗”而失踪了。她质疑为什么世界对她和三个孩子变得如此冷酷。她写信说，粮食配给停发了。尽管她住在乡下，却买不起菜。她每天在家工作到半夜，只能挣到两日元。而买4公斤土豆就要35日元。一位寡妇问，为什么在同样的年月，战争未亡人就该忍饥挨饿，而以前的官僚和军人们却可以大肆盗用军需物资。她询问，难道就没有办法让她拿到一个月的津贴，或者给她一点军用物品，哪怕只有一条毯子也好？

另一位妇女的丈夫仍然下落不明，她抱怨说，退伍士兵回家还有遣散费，配给粮食和衣物。相反，她和孩子们只能等着饿死。她哀怨地问，当她和像她这样的妇女还在挨饿的时候，空谈妇女参政之类的事情有什么用处呢？⁵¹ 这是一个在许多地区都出现的问题：当人民在千疮百孔

的土地上面对支离破碎的人生景况时，哪里还谈得上表层的、抽象的政治理想呢？

注释：

- 1 相原悠的来信，《朝日新闻》，1994年8月14日。从技术上来说，这并非第一次对天皇声音的广播。1928年12月，在转播一次阅兵式时发生了一点小事故，不经意将天皇宣读敕语的声音广播了出去。《朝日新闻》，1995年5月16日。
- 2 作为一般原则，有关天皇行动的日方秘密文献必须谨慎处理，因为它们是基于天皇近臣的记录和回忆完成，而这些近臣们总是致力于为天皇的形象增光添彩。关于日本最高层的行动导致天皇玉音放送的最早的官方报道，是由迫水久常于1945年11月向美国占领军当局传达的。日本投降时迫水久常任内阁官房长官，并参与了投降诏书的起草。迫水久常强调天皇决定亲自广播投降的消息。参见美国国务院，*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5, 6:702-708。（以下此基本文献引用为FRUS。）有关这一问题以及关于天皇裕仁的日本资料，最方便的辑录，是由鹤见俊辅、中川六平编辑的两卷本《天皇百话》（东京：筑摩书房，1989），尤其是上卷pp. 683-699。其中包括终战诏书全文（697-699），以及对天皇战争发起人角色的确切证词（690）。诏书文本经过了几手修订，其中包括两位研究中国古文专家的润饰，他们不仅负责检查音韵与语法的恰当与否，还建议使用贴切的典故成语，出处同上，pp. 684-687。几十年来，有关日本投降的英文基本文献只有两本：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Washington, D. C. ;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和 Robert J. C. Butow 的 *Japan's Decision to Surrend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对这些研究批判性的检讨，参见 Herbert Bix, "Japan's Delayed Surrender: A Reinterpretation", *Diplomatic History*, 19.2 (spring, 1995): 197-225。
- 3 有关这一争论的例证，参见《朝日新闻》社论，1945年8月16日；读者来信，《朝日新闻》，1945年10月21日；日高六郎，《现代意识形态》（东京：劲草书房，1960），pp. 230-231。
- 4 1945年2月有名的《近卫上奏文》曾上奏天皇，表达战败后有可能发生革命剧变的担忧。有关此种恐慌，参见 John W. Dower, *Empire and Aftermath: Yoshida Shigeru and the Japanese Experience, 1878-1954* (Cambridge, Mass. :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79)，第7、8章；以及 John W.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一书中的论文 "Sensational Rumors, Seditious Graffiti, and the Nightmares of the Thought Police", pp. 101-154。
- 5 《木户幸一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p. 137。
- 6 战败之后，据推测陆军超过300人、海军约有50人自杀。参见草柳大藏《内务省对占领军》（东京：朝日文库，1987），p. 16。据另一项统计，从天皇玉音放送到1948年10月，共计527名陆海军人员，以及少数民间人士，因战败的责任感而自裁。参见鹤见、中川编《天皇百话》上卷，pp. 714-716。

- 7 Marlene Mayo, "American Wartime Planning for Occupied Japan: The Role of the Experts", 参见 Robert Wolfe 主编 *Americans as Proconsul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in Germany and Japan, 1944 - 1952*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Press, 1984), p. 34。另可参见 Roger Buckley, "Britain and the Emperor: The Foreign Office and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Japan, 1945 - 1946", *Modern Asian Studies* 12.4 (1978): 557 - 558, 以及重光葵有关这些事件的记录, 参见鹤见、中川编《天皇百话》下卷, pp. 23 - 25。
- 8 各种正式投降文书刊见载于 1945 年 9 月 2 日《纽约时报》。日方的积极反响被注意到了, 可参见日本新闻研究会编《昭和“发言”の记录》(东京: 东急エージェンシー, 1989), pp. 100 - 101。
- 9 Walter Krueger, *From Down Under to Nippon: The Story of the Sixth Army in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D. C.: Combat Forces Press, 1953), p. 339。
- 10 参见《昭和“发言”の记录》, pp. 100 - 101; 《纽约时报》, 1945 年 9 月 12 日。接下来麦克阿瑟评论说, 日本可能会重新作为亚洲的商业领袖出现, 但绝不可能成为世界强国。数周后, 五星上将 William Halsey (在表达了战争“结束得太早, 因为留下了太多的日本佬”的遗憾之后) 宣布, 如果贯彻执行麦克阿瑟的方针政策, “日本将永远不会上升到五六名的位置”。参见《纽约时报》, 1945 年 9 月 25 日。
- 11 参见美国陆军部,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volume 1, supplement, *MacArthur in Japan: The Occupation: Military Phase* (Washington, D. C.: U. 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原文 1950 年由麦克阿瑟的总参谋部起草, 但直到 1966 年才公开发表), p. 131。9 月 21 日, 麦克阿瑟的讲话再次被广为征引, 当他告知美国合众国际社总裁, 日本“罪孽的惩罚刚刚开始, 将会漫长而痛苦”时, 借机重申日本将“永不”可能再成为世界强国。参见《纽约时报》, 1945 年 9 月 22 日。
- 12 Edwin A. Locke Jr.,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President's Secretary File, Box 182, Papers for Harry S. Truman,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o. 感谢三浦阳一提供这份备忘录的副本。
- 13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被引用最多的一份报告说, 日本“定然”将在 1945 年底之前被迫投降, 而且“极有可能”是在 11 月 1 日之前, “即使没有原爆, 即使俄国没有参战, 甚至即使没有入侵日本本土的计划或预期”。参见 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s *Summary Report (Pacific War)*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July 1946), p. 26。还可参见调查团报告, *Japan's Struggle to End the War* (July 1946), p. 13。这一推定是否正确, 仍然有探讨的余地。
- 14 日本战争损失的基本数据, 1949 年 4 月发表于经济安定本部的报告书中, 此后被广泛引用。例如, 大藏省财政史室编《昭和财政史——终战から讲和まで》(东京: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78), 第十九卷, pp. 15 - 19。
- 15 更详尽的统计数据与评注, 参见 Dower, *Japan in War and Peace*, pp. 121 - 122。
- 16 *FRUS 1946*, 8:165。亦参见前引之《昭和财政史》, 出处同上。以及中村隆英, 《日本经济: その成长と构造》(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81), p. 15。以上各种计算不包括日本亚洲帝国的损失, 四十年间它投入了巨大的私人 and 公共财力资源。
- 17 Russell Brines, *MacArthur's Japan*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Lippincott, 1948), p. 40。另参见 William C. Chase, *Front Line General: The Commands of Maj. Gen.*

Wm. C. Chase (Houston: Pacesetter Press, 1975), p. 127。

18 例如参见前引之 Brines, pp. 26, 39 - 40, 117。

19 Harry Emerson Wildes, *Typhoon in Tokyo: The Occupation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Macmillan, 1954), p. 2. 对大阪这类场景的生动描绘, 参见由大阪府编辑出版的《大阪百年史》(大阪, 1968), p. 907。

20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1; supplement: 117 - 130, 148 - 193; 至于帝国各个区域的崩溃情况, 参见第 148 页图表。可参照讲谈社编《昭和・二万日の全记录》(东京: 讲谈社, 1989), 第七卷, p. 274。(以下这部多卷本的昭和时代的逐日记录被引作 SNNZ。)

21 SNNZ 7: 300.

22 SNNZ 7: 132.

23 数百名这样被抛弃的孤儿, 都很贫穷而且只会说中文。1980 年代开始, 他们由官方资助旅行去日本, 试图与他们的家人重新建立联系。即便真的团聚了, 他们也是极度痛苦。

24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1; supplement: 162, 165, 173, 174, 176.

25 出处同上, pp. 158 - 159, 161n, 173, 178 - 179。另参见 *FRUS 1946*, 8:311 - 312。英方还拖延了从香港遣返投降的日本人。

26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1; supplement: 158, 170 - 176, 191 - 193.

27 例如 1948 年 11 月, 从苏联遣返日本人的永保丸上发生了骚乱, 船上突然唱起了共产主义歌曲, 有人发表共产主义演讲, 开始拒绝与占领军当局合作。同类事件还在 1949 年 6 月和 7 月间发生过。

28 *FRUS 1946*, 8:306; 前引之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1; supplement: 179 - 191。苏联发布的名单, 参见《朝日新闻》月刊 1991 年 7 月特刊《镇魂西伯利亚》。死于苏联之手的日本战俘总数, 据估计有 55000 到 113000 人。参见 Philip West, Steven I. Levine 与 Jackie Hiltz 编, *America's Wars in Asia: A Cultural Approach to History and Memory* (Armonk: M. E. Sharpe, 1998), p. 232。

29 有关这一 1950 年的漫画形象, 参见长谷川町子, 《サザエさん》, 第七卷(东京: 姊妹社, 出版日期不详), p. 68。

30 袖井林二郎, 《拜启マッカーサー元帅様: 占领下の日本人の手紙》(东京: 未来社, 1982), pp. 173 - 174。

31 《每日年鉴》, 1949, pp. 96 - 97。归国人员还包括几千名曾在美国因种族背景被监禁, 于战争结束时要求遣返日本的日裔美国人。其中除了不能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且对祖国保持强烈忠诚的第一代移居美国的日本人之外, 还包括许多第二代日裔美国人, 他们由于出生在美国, 因而具有美国公民身份。这些第二代日裔美国人, 大多数曾在日本生活多年, 并于珍珠港事件前返回美国。参见袖井林二郎, 《私たちは敵だったのか——在米被爆者の黙示录》(东京: 潮出版社, 1978), pp. 55, 73 - 78。

32 前引之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1; supplement: 89 - 115。参见 p. 108 有关九州活体解剖事件, 以及 p. 109 有关一些战俘受到战俘营下级看守“仁慈”待遇的参考资料。一说, 在日本境内共有 32624 名同盟国战俘, 从总共 127 所战俘营中获释 (pp. 102 - 104)。

- 33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1: supplement, pp. 169 – 170, 173 注。
- 34 出处同上, pp. 169 – 170。
- 35 仓光俊夫,《浦贺》,《文艺春秋》,1946 年 1 月号。收录于平凡社编辑部编《昭和世相史 ドキュメント 战后篇》,(东京:平凡社,1976), pp. 148 – 153。(此文集下引为 SSS)。
- 36 仓光俊夫,《引扬孤儿》,《文艺春秋》,1946 年 12 月号。收录于 SSS, pp. 153 – 159。
- 37 SNNZ 7:280。
- 38 SNNZ 7:274; NHK 放送文化调查研究所,《GHQ 文书による占领期放送史年表(1946)》(东京:NHK, 1989), pp. 58, 69, 73, 76。
- 39 *Reports of General MacArthur*, 1: supplement: 187 注。
- 40 朝日新闻社编《声》第 1 卷, 1945 — 1947 (东京:朝日文库, 1984), p. 182。《声》是《朝日新闻》编辑部读者来信栏目, 此卷是战后首次出版的读者来信选集。此文献下引为《声》。
- 41 《声》第 1 卷, pp. 200 – 202。
- 42 栗屋宪太郎编《资料 日本现代史》第二卷(东京:大月书店, 1980), pp. 38, 41, 76, 82 – 83, 109, 175, 197。此书是投降之后日本国内报告颇有价值的辑录。另参见栗屋宪太郎、川岛高峰,《玉音放送は敵の謀略だ》,《THIS IS 读卖》月刊, 1994 年 11 月, p. 52。
- 43 “活着的英灵”(生きている英灵)一词,引自野田光春,《捕虏の记》,《新潮》1947 年 1 月号。收录于 SSS, p. 139。战争中日军被俘的人员,通常被通报为已死亡,因为官方政策将落入敌人之手当成是社会的耻辱。因而,不准确的战死者报告,既有故意也有不知情的误传。
- 44 《声》第 1 卷, pp. 102 – 104, 152, 191 – 192。
- 45 《声》第 1 卷, pp. 266 – 267。
- 46 SNNZ 7:288 – 289。
- 47 1948 年 5 月 30 日《サンデー毎日》,收入 SNNZ 7:309。《战后体验》(东京:河出书房新社, 1981; 这是《人生读本》杂志系列中的一辑), pp. 91, 96。《钟の鸣る丘》(《钟鸣之丘》),一档有关战争孤儿的广播节目,提供了多愁善感与忽视共存的清晰证据。尽管 1947 年节目开播是占领军当局的命令(灵感源于美国 Boy's Town 孤儿院院长 Flanagan 神父的来访),并且由于盟军最高统帅的坚决主张,得以延续到 1950 年,但是节目的确受到了相当的欢迎。参见《战后体验》, pp. 83 – 85。
- 48 林芙美子的文章,被收录于文艺春秋社编,《〈文艺春秋〉にみる昭和史》(东京:文艺春秋, 1988), 第二卷, pp. 26 – 34。
- 49 《朝日评论》, 1948 年 12 月; 收录于《战后体验》, p. 134。
- 50 SNNZ 7:288 – 289。“收容所来的家伙”, 日语为“施設の者”。
- 51 《声》第 1 卷, pp. 70 – 72。